

## 且看 80 后大学生们的各色“账单”

暑假刚开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二年级的小谢就早早寻找家教工作了。他有自己的打算,新学期开始要交的1万多元学费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虽不算高,可他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家里的负担。

在现在的大学中,不少80后一代正同小谢一样开始学会记账了,他们知道现在如何衡量自己的价值了。这个账怎么算、要算哪些账……大学生们的探索令人深思。

## 逃课是要“花钱”的

大学生们在记账,这是过去谁也不曾注意的事实。

在宁波大学科技学院,记者看到了一位女生7月份的开销记录。在早餐“账单”上,记录着7月份的每天早餐花费。这笔“账单”令记者很意外,没想到还有大学生是记账的,并且能坚持下来。从“账单”上看,这位女生饮食花费很少,基本上就是早饭和水果,相当多的钱花在了服饰、化妆品等方面。

有了记账,就有“算账”。以打工为例,现在大学校园内的“打工一族”并不少,理由不尽相同:有的为了锻炼自己,提前进入工作状态;有的为了完成学校的要求;有的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这些学生们真的开始“算账”了。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大二学生小张算的一笔“特殊账”,让自己大吃一惊——逃课账。

为了打工,有的学生选择“逃课”,一学期内只在第一和最后一节课出现在课堂上。当然,这不完全是以打工为理由,也包括沉迷网络游戏、懒惰不想早起等原因。

按小张的算法,每个学分、每门课、每节课都是有花费的。学分费等于四年学费除以学分,一门课费等于学分费除以一学期课时,一节课费等于一门课费除以2。

那么,以宁波大学科技学院一位大二学生为例,一年学费为1.7万元,四年6.8万元,学分为160分,那么一个学分的费用就是425元;如果每学期完成基本的学分15分,就是6375元;一学期是34节小课,一节小课就需“花费”187.5元。如果逃三节课就是562.5元,这几乎是多数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家教每小时25元来计算,这名学生需要打工22.5小时才能挽回逃课损失,可逃掉的三节课只有2.25小时!这样一笔账,是赚是亏,任何一名学生心里都很清楚。逃课,竟然是需要“花钱”的。

如果一名大学生因打工旷课,到期末可能挂科,挂科



大学生是手机普及率最高的人群之一。

要补考;补考不过,还得重修;重修不过,拿不到学分,就有可能毕不了业……这每一步都得花钱花时间,处理不好,有的学生心里有可能是一笔糊涂账。

## 今天大学生都在算些什么账

今天的大学生,都在算些什么账呢?

在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记者找了4位记“家教账”的大二学生,他们的月收入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在打工收入花销上,除了作为生活补贴,学生们更喜欢把它作为“特别资金”,用于外出旅游等方面。有一位同学打工赚的钱除用于生活费外,有1200元用于去西塘、黄山旅游。

打工创收的同时,有的学生还算了消费账。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将打工收入用于考取教师资格证与秘书资格证,共需530元,比他的打工收入要高一

倍,可他认为:“这是自我素质提升的需要,值!”浙江大学国际新闻专业一位大三学生把打工钱用于参加英语学习,花费达数千元,他觉得这是为将来有出国需要做准备,这笔账划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消费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新的消费内容。在浙江工业大学等几所高校的几位被采访学生中,竟然都出现了请客的内容,消费基本在100元到400元间,而请客的理由包括“过生日、工作需要、朋友往来与学校工作离职”。

“这没什么奇怪的,学校是个小社会,请客之风并不少。”家在山东的学生小彭说。在杭州市各大高校附近,饭店生意并不错,同学生日要请客,谁交了女朋友要请客,组织活动结束要请客,当上学校社团负责人要请客,学生组织换届离职要请客,学长离校要请客……请客名目繁多,花销也不小。事实上,这些钱都是学生辛苦挣来的,如果不好好计划,恐怕只在手上“中转”一下而已,最后记的是“流水账”。

在一位女学生去年9月和今年4月的消费记录上,可清楚地看到除手机费、饭卡和“打的”等名目外,还有“恋爱经费”。“账单”显示,今年4月8日,有一笔100元的“恋爱经费”发生,在“账单”中属于花费较高的。大学生恋爱早已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可学生还在主要依靠家庭经济支持的时候,从何而来这一笔“恋爱经费”呢?

## 记下大学四年的每一笔账

有关人士认为,80后的新一代大学生们,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与特点,更有着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方式。无论打工账、逃课账、请客账、恋爱账,他们学会“算账”,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值得肯定的事情。

“月光族”“啃老族”“吃瓦片族”是社会上对80后一代最多的评价。在不少人眼中,80后一代不算账,也不会算账,可眼前的一本本“账单”却让人真的惊讶。

当然,有的“账单”中也体现了80后一代不善于“算账”的特点。比如信用卡的出现成了大学生们“超额消费”的“救星”,刷卡更成为一种时尚。本科生有3000元可以透支,研究生有6000元可以透支,这样的自由度,对于一些自制能力还够好的学生而言,刷卡消费的方便和抽象的数字显示,使他们几乎没有了钱的概念。一位姓赵的女学生就感觉到,没钱就等着父母存钱,好像花的真不是“自己的”钱。

前不久,浙江当地一家媒体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提

出应届毕业生大学里要上好“最后一课”——在走上工作岗位前给自己的大学生活算一笔账,看看四年里花了多少钱,并与全家收支情况进行比较。其实,这样的一笔账有的家庭在孩子进大学之前就算过了,毕业之后再算,或许是一种反思:四年花了这么多钱,到底有没有价值?毕业了,工作了,能赚回多少呢?几年可以赚回呢?

事实上,每一笔账都不好算,因为大学生们不能将其真正定量,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笔账就不去算了,而是要早早算、好好算,可以尽量地去记录,作为四年青春生活的一笔宝贵财富。这些“账单”里包含的不只是物质的消耗,更是一个人的亲身经历。

80后的大学生是独立的、有主见的,可他们并不是“垮掉的一代”,只是涉世未深的他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和判断力。因此,他们需要一些提醒,与其四年后回头看时方后悔,不如从现在开始,算好自己的每笔账,学会去衡量这四年里什么才是重要的。

据新华社



调查显示,在京津冀地区大学生中,48.9%的大学生拥有自己的电脑。

## 归巢创业:农民工演绎精彩“三部曲”

## 他们是谁?

农民、民工、创业民工?没有一个合适的概念能够准确地描述这个群体现在的社会身份。他们曾经是农民,做过农民工,现在回到家乡成为一个创业者。

## 他们为什么回来?

有人说,城市不是我的家,那里没有我的未来;有人说走出去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回来。于是,他们选择在青涩的时候叛离,在成熟的时候荣归。

## 他们在做什么?

制造业、加工业、建筑业、商贸、物流、养殖——他们都能做,他们都在做,唯一没做的就是荷锄下田。

## 他们成功吗?

在城市,他们是手中紧握暂住证的过客,而在家乡他们却能够赢得公平平等的发展机会。创业的过程尽管艰辛,但有创业冲动的人本身就是人生的成功者。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有能力改变家乡的命运。

农民工正在完成自己的“第三步”,伴随着进城打工——成长积累——自主创业的“三部曲”,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鼓励政策也同步跨入了“第三步”。

“通过10年时间跟踪调研,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的崔传义与张忠法两位研究员分别赴安徽六安、河南安阳调研后告诉记者:“民工潮进入新阶段,农民工回乡创业也进入新阶段,出现新动向。”同样,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克明研究后发现,农民工出现了“三打变两打”的可喜转变,即农村劳动力由原来的“年轻人打扑克、妇女打毛线、老人打瞌睡”,逐步向“先流动出去打工,再打道回府创业”的转变。

在刚刚过去的5月与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调研,仅仅是多路调研大军中的一支。同时,中农办、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农民工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组成的调研组,赴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专题调研农民工回乡创业。

其实,从1994年首届“创业之星”大会以来,农民工回乡创业早已不再是新鲜话题,被冠以“凤还巢”、“回归工程”、“归燕工程”等美丽名称的民工回乡创业,在地方上的探索与实践早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那么,为什么现阶段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特别重视呢?这还要从一封信开始说起。

## 一封创业之星的来信

2007年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除夕之夜,贵州创业之星——贵州梦润鹤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富,以“外出务工、回乡创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信”。

张明富早年由于家庭贫困,1980年时上高中不到两个月就失学,于是南下广东开始了打工生涯。历时25年的奋斗与积累,2005年底回到自己家乡——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凉风村,创办了一个循环经济模式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梦润公司。经过两年经营,张明富发现自己创办的企业在带领农民致富、新农村建设、创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出了多重效应。

同时,张明富告诉记者,通过自己的观察,他发现农



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春节前到黑龙江出差时,看到了农村的萧条之后,他陷入了沉思中。

如何才能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呢?“春节那天我就一直在思索,但是,应该把问题向谁说呢?”张明富为难了,他告诉记者:“既然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农村,是不是应该向总理提出自己的想法?”于是,就有了春节时寄往北京的那封亲笔信。信中不仅有张明富自己打工与创业的亲身经历,有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观察与思考,还分析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积极作用和遇到的困难,特别是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很快,不到一个月,3月14日,温总理就做出批示,要求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也分别做出了批示。随即,国务院农民工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开始了典型调研与鼓励支撑政策的论证设计等工作。

于是,“创业之星”张明富的一封信,就成为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政策出台的“催化剂”。

## 齐头并进摸家底

6月1日,一封邮政特快专递寄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宣告福建省清流县开展农民工回乡创业问卷调查的圆满结束。根据国务院农民工办的工作安排,清流县劳动保障局会同统计、金融等部门,历时半个月完成调查工作。

但清流只是全国110个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中,开展农民工回乡创业有关问题问卷调查的一个。

5月份,全国110个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由县劳动保障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以召开回乡创业农民工座谈会、访谈和问卷等方式对县、乡镇、村和回乡创业农民工展开调查,重点调查村和回乡创业农民工。每个县调查1个乡镇,该乡镇的3个村以及3个村所有的回乡创业农民工,并分别填写乡镇、村和农民工回乡创业情况调查表。以参

加此次调研的安徽省太湖县为例,该县确定小池镇为本次调查乡镇,小池镇小池村、白沙村、天龙村为本次调查的3个村,调查人员对3个村回乡创业的农民工进行个别访谈,对回乡农民工进行探索性、全面性调查。

在此之前,4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一篇关于安徽省农民工回乡创业,特别是无为县“凤还巢”的文章,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4月19日,华建敏作出批示,要求国务院农民工办、国务院研究室、银监会组织力量作一次典型调查。于是,5月17日至1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率国务院调研组,到安徽省专题调研农民工回乡创业。

在更早的2006年下半年,农业部乡镇企业局通过对河南、四川、安徽、湖南、贵州等中西部10省区的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农民工回乡创业,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真正实现从外出打工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回乡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

实际上,像张明富这样的回乡创业者,正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金桥”。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司叶兴庆、王飞等人对安徽、江西、重庆等省市的调查和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中西部10省区的调查都发现,农民工回乡创业所从事的行业与打工经济密切相关,带有明显的产业转移特征。由此,中西部也走出了“第三条道路”,即通过打工使青壮年农民素质普遍提高来改造乡村,并以回乡创业者为领头羊带动城镇经济的繁荣,渐进推进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这是提升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境界的良性循环。

## 创业起步但未成潮

“从2003年以来,回乡创业的趋势明显加快,有的地方出现了成倍增长。”崔传义告诉记者。从1997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就开始进行样本调查,并且进行了10年不间断的跟踪调研。

那么,全国回乡创业者的总体状况是什么样呢?目前,劳务输出超过1000万人的省有河南、四川、安徽和湖南四个,湖北、江西等省超过了500万。全国劳务输出的总人数在2亿左右,跨地区性的输出有1.2亿人。根据相关部门调查统计,在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有7%~10%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人数上有1400万~2000万人具有创办企业的能力。

但是,根据叶兴庆等人对安徽、江西、重庆等省市的调查显示,各个地方普遍存在回乡创业的现象,并且涌现出了很多典型亮点,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中西部10省区的调查同样发现,人数并不多,他们创办的企业总数只占到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20%。

像张明富这样“昨天是农民,今天是打工仔,明天是

创业者”的农民工,根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的调查,全国有500万人。但相对于全国“打工潮”劳务输出的总人数,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因为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中已经有7%~10%具有创业能力,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全国2亿农民工可以有1400万到2000万人回乡创业。

同时,从中西部不同省份的实际调查结果来看,与1400万到2000万人的差距仍然很大。以“凤还巢”工程著名的安徽省无为县为例,全县140万人中有42万农民工,回乡创业者14000多人,占劳务输出总人数的3.4%,占全县总人数的1%;四川金堂县89万人中务工13万人,回乡创业6500人,占农民工总人数的0.75%;河南信阳以打造劳务经济品牌闻名,全市回乡创业的农民工有18000多人,仅占信阳劳务总人数的1.0%。

由此可见,不管是与长三角毗邻的安徽,还是“劳务经济第一大省”中部河南,以及西部的四川,回乡创业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换句话说,农民工回乡创业还没有形成“创业潮”。正如张明富给总理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回乡创业者多,但做大做强很少,回乡创业者是投资的‘弱势群体’。”

## 农民工“三部曲”

如果我们深入中国农民工潮起潮落20多年的历程,就会发现,中国农民工演绎了自己的精彩“三部曲”:进城打工——成长积累——自主创业。张明富的个人经历就是一个典型:80年代进城打工,经过10多年奋斗获得了“第一桶金”,并且积累起创业的能力与实力,然后,回乡创业。

像张明富这样,从一个农村中的普通农民成为沿海发达地区企业中的打工者是第一次飞跃;从一个打工者成长为一个积累财富、掌握技能的人是第二次飞跃;再从一个进城务工者成为企业的主要管理者甚至所有者是第三次飞跃。经过20多年,农民工正在完成自己的“第三步”,即为自己找到一个就业位置到为其他人创造一批就业位置,从为一个人挣钱谋生到组织带领一批人创造财富。

同时,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说,第一步是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第二步是解决农民工进城后的问题;以2006年3月,《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农民工40条)为代表,这是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第一个关于农民工政策最为系统的文件,主要是解决了农民工进城后的工资拖欠、权益保护、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劳动环境等问题。

但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主要是围绕促进农民工外出,转移培训,以及农民工进城后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在鼓励回乡创业上反而没有政策吸引力,叶兴庆等人的调查报告的结论中认为:“县里比省里重视,省里又比中央部门动手早,中央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还没有明确地扶持政策。”

因此,农民工“第三步”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崔传义认为,解决农民工进城后的问题与解决回乡创业的问题,是两位一体的重大战略。

2007年5月~6月,随着国家部委和研究机构到地方上的深入调研,《关于引导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见》(回乡创业29条)的讨论稿已经形成,这是国家第一次专门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出台的政策性文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农民工走出了进城打工——成长积累——自主创业的“三部曲”。将要发布的“回乡创业29条”,将着重解决农民工“三部曲”中的第三个阶段,即回乡创业所面临的问题。

据《决策》